

弃,而原子真理也一同被抛弃了。用通常話的語言所作的陈述据说都各自有其自身的邏輯,而詞的意义則声称就是其实际用法。邏輯的理想語言是沒有的,把真理当作符合实在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必須摺弃。剩下来可做的事只是將詞在各式各样情况下的公認用法组织起来,哲学家根本沒有权利改正这些用法。

經驗主义的总假設是,最可靠的起点是一个个人心灵面对其自己的个别世界。所以这里的困难是这样的一个心灵怎样能知道其它的心灵和一个共同的世界呢?便是給这样一件事下个勉强解釋也不容易。把結論落实到实証主义,說既沒有客观实在又沒有一个主体,并不解决问题,而只是避开問題不談。

所謂“从真理倒退”就是这样。本书的最后三分之一則簡述走向真理的途径——鮑桑凱留下的唯心

主义,稍微涉及一点克罗齐。和本书其余部分一样,文章写得很出色。作为一个信仰的供状,这部分对于那些尊重“新黑格尔派”的人(如我这样)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新黑格尔派把一切經驗都看作隶属于哲学領域,而不赋予感觉以絕對特权,而且在分析、归納、形式演繹、和排除之外还发现有其他思維方式。在我们有些人看来,近似新黑格尔派过去做的那样来一次解放,在哲学上和教育上好象都是可行的。但是象作者那样号召回到黑格尔的体系上去,是不是合时宜呢?我们从晚近的經驗主义者是获得一些东西的,即使只是些非常辛辣的东西。可惜的是这些經驗主义者肯定得太托大了,以至于不能从康德、黑格尔及其后继者那里接受一点东西过来。

(摘自英国《精神》杂志和《哲学》杂志

1960年1月号,周煦良译)

评熊彼得:《經濟分析史》

[美] 維那尔① (Jacob Viner)

熊彼得著的《經濟分析史》的出版,是学說史(Dogmengeschichte)中的一件大事。它的論題是从古代希腊一直到凱恩斯。它的目的是叙述对經濟理論发展有重大貢獻的一切作家。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經濟学家写的一部龐大的学說史,而他自己就是有創造性的、权威的和渊博的經濟理論家。熊彼得的学术修养超过了一般經濟学家,他能够便当地有力地应用經濟理論家所使用的全部技巧,如同靜态分析、动态分析、历史分析、数学与統計分析、部分均衡与一般均衡分析。我们将会看到,这本书有許多重复的、不相干的、隱晦的、偏見很深的、似是而非的或对理解沒有帮助甚至有害的地方。撇开这一切不談,它对我們的学說有关分析方面的历史,还是有相当的貢獻,而且是最富于建設性、創造性、学术性和最卓越的貢獻。

熊彼得关于学术史的知识,就广度和深度說,都給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对之主要是謙虛而恭敬地表示欽佩。然而我多少覺得他也有几处地方搞錯了,提出來也許是有幫助的。

談到配第使用“数字”进行經濟分析的創造性著作时,熊彼得不曾指出,这些“数字”中有些是不成熟的想像的結果,或任意搬弄資料的結果。說“不會有

人攻击”《政治算术》,是不真实的,从17世紀后期到18世紀,它經常是諷刺的对象。

熊彼得認為,古代希腊和罗马极少經濟分析。我沒有資格反駁这个論断,然而我以为,除了他挑选出来的以外,还可作些补充。

熊彼得根据亚里士多德《倫理學》中的一段,說他“探討了劳动成本价格学說”。就我所知,第一个把劳动成本价值学說归功于亚里士多德的,是1797年一个古典学者季里斯(John Gillies),事实上他曾經指謫亚当·斯密剽窃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說。当近年来奥国学派的效用或需求式价值学說盛行时,評論家又发觉亚里士多德是这一学說的先驅者。我无法

① 維那尔(1892—)是美国庸俗經濟学家,曾任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有《国际經濟学》和《国际贸易与經濟发展》等书,短篇論著也很多。1958年,他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將比較重要的一部分汇集成书出版,題为《長期观察与短期观察》(The Long View and the Short),用来紀念他的65岁誕辰。本文是其中一篇书评(原載《美国經濟評論》1954年12月号),主要是評論熊彼得在其所著《經濟分析史》中的一些錯誤观点。——譯者

断定亞里士多德究竟要論証什麼，但有一點，要是近代翻譯够用的話，他的書仅仅明白承認勞動是一個生產要素，其中沒有東西說得上是勞動價值學說。

熊彼得在論述經院哲學家的經濟學說時，一直為之大力辯解，仿佛它迫切需要保衛，以免人們遺忘掉，或遭到象幾代以前那麼普遍的無情攻擊。他在論述中，不僅把它的價值和貨幣理論說成是根本健全的，而且是新穎的，在許多方面勝過後來公認的學說。後期經院哲學家具有“完滿的供求論的一切因素……如在19世紀獲得發展的表格和邊際概念等技術工具，這的確都應歸功於他們。”

我關於經院哲學家著作的直接知識是片斷的，但是我廣泛閱讀了第二手材料，新的和舊的。就我所閱讀的來說，我的一般印象是，熊彼得對於他們的貨幣和價值學說的敘述，大體正確，對於他們的贊揚，儘管過分些，也大都是正當的。然而談到經院哲學家的高利貸（利息）學說的分析價值時，我以為，他的辯解就完全沒有道理了。這是與公正價格不同的，關於什麼可以做，甚至什麼可以講，教會當局都有決定性的力量。

教會的標準學說是，貨幣資本是不生產的（換個說法，利息是不合法的）。這裡要注意，利息的禁止，不只是根據教義理由，而且也根據經濟和功利理由。在區別合法和非法的過程中，這個學說愈益複雜細致，關於某些交易的合法性的論証，往往標志着分析的見識和發展。事實是，經院哲學關於高利貸的大部分文獻是要闡明，貨幣借貸（mutuum）與暗含有利息因素和帶有其他因素的交易間在經濟上有着明顯的區別，能夠根據倫理和經濟理由合理地並根據宗教教義必然地要譴責前一種人，而使後一種人成為合法的。為熊彼得所接受的一般辯解是，從歷史經濟情況看，這一區別在當時有其經濟和福利價值，可是後來不存在了。在我看來，這個說法沒有根據，而且大有問題，除了辯解的目的外，根本不能成立。他為經院哲學家的利息學說進行辯護的一部分動機似乎是因為，他自己的利息學說與之有類似的地方，象後者一樣，它對貨幣借貸的利息和耐久物質資產的直接收益做了明顯的劃分。

熊彼得同樣熱情地維護重商主義學說。因為他覺得，重商主義者的國家目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合理的，這包括金銀貨幣的無限積累，除原料外其他一切產品的力求自足，以及他們認為能夠促進這些目的的特殊手段的方便性和正當性。這種看法沒有

什麼新奇的地方。然而近幾十年來的事件是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我的論斷，即重商主義者對於國際經濟問題的考察，就分析方面、實際方面和功利方面說，都是錯誤的。

熊彼得關於亞當·斯密《國富論》所寫的“讀者指南”，是描繪那本書中理論結構或“體系”的極好概括。不論斯密作為一個理論家，作為一個人，或就其社會觀點來說，熊彼得都不喜歡他。儘管《國富論》是部“偉大的分析作品”，它完全沒有獨創性。其中“沒有一個分析概念、原理或方法就1776年來說新的”。從經濟分析家的觀點來看，他的許多前輩都勝過他。韋里（Verri）的經濟均衡概念“就當時的發展來看要比斯密好些，而不是差些”。他提到斯密的時候，多半是敵視的。我認為，我們不需要把斯密捧為經濟學界的英雄，就可以斷定，熊彼得的反對意見，由於他們彼此間“意識形態”的衝突而多少有點削弱了。

關於李嘉圖，主要的一點是熊彼得幾乎完全否定了他的一種分析，即用供求來解釋市場價格的決定，而否認供求對於“自然的”或長期的正常價格的作用。其實這不是李嘉圖的發明。這種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紀。然而到後來，一般都使用“需求”（和相應的“供給”）這個名詞來說明以往某一市場在一定現實時間和一定現實價格下的那個數量，也用來說明“觀察家頭腦里一種高度抽象的創造”，即長期的正常需求函數。說這是語義上的不幸，是有道理的。

熊彼得認為，這一點不只是語義問題，他提出的唯一証據，是有關李嘉圖《原理》第30章的一個說法：“在李嘉圖體系中，價格能夠不靠生產擴充而直接跌到成本水平”。看來這一章中可以用來支持這個說法的只有李嘉圖舉的一個例証，這用近代術語來說，就是彈性為零的需求曲綫和彈性無限大（不變成本）的供給曲綫的交點。

在《論馬爾薩斯》一文里，李嘉圖提到馬爾薩斯《原理》一書論証下述命題的一頁：（一）單單成本改變而產量不變，不會引起價格的變化；（二）“供求關係……是決定市場價格或自然價格的基本原理，生產成本只有從屬作用，它只能影響到……供給和需求間的關係。”李嘉圖評論道：“據我所知，不會有人對這些命題前后的見解，提出異議。”在這句話上面幾行里，李嘉圖又說，在帽子依不變成本生產的情形下，“其市場價格決定於供求——即決定於生產成

本。撇开未語不談，在价格分析方面，不論李嘉图或马尔薩斯都不存在熊彼得所主張的二重性。如果說他們兩者間有什麼顯著不同的話，那是由於李嘉图集中注意不變成本情形，因而無法適當說明長期价格的決定問題，這裡，需求數量和供給數量都是以价格为轉移的變數。如果李嘉图在他的價值論證中主要關心的不是說明一定的價格結構怎麼產生的，而是說明（一）各種生產要素數量的不同變化對一定價格結構的影響，和（二）價格結構的變化對生產要素的相對數量的影響，那末熊彼得對李嘉图分析的許多其它批評，也就站不住了。

李嘉图強調勞動成本在決定相對價格中的作用，可能有四種（或更多的？）解釋，熊彼得不會說清楚，他究竟接受哪一種：（一）是使分析簡化的一種方法，並無其它的含義；（二）事實上勞動成本是總成本中的主要部分，就某些或大多數目的來說，這是近乎真理的情形；（三）在單位成本中，勞動成本比其它成本對於價值的決定具有更大的意義，它也比其它各種成本具有更大的福利意義或倫理意義。

1820年6月13日李嘉图在寫給麥庫洛赫（McCulloch）的一封信里說：“地租、工資和利潤等重大問題……實際上同價值學說沒有關係”，熊彼得根據這一點認為，“萊特（Knight）教授的提示有道理（在李嘉图《原理》一書中），‘分配問題……根本不是作為評價問題來考察的’”。他斷定說：“這的確表明，李嘉图對資本主義分配是價值現象這個事實的充分意義，不會有清晰的解釋”。這完全要看李嘉图所謂“價值學說”是什麼意思了。我以為，從字面看來很清楚，李嘉图這裡說的不是相對價格的決定，而是找出不隨時間變化的“價值尺度”，它本身具有穩定的價值。

我懷疑，李嘉图是否真的認為“商品的‘真實價值’是由最不利的企業所遭遇的‘實際困難’來‘調節’”。要證明這一點，那就得確定，對李嘉图來說精耕邊際（intensive margin）不起作用，而處於粗耕邊際（extensive margin）的生產者總歸是或通常是效率最差和收入最低的農場主。

熊彼得一再把李嘉图的地租學說和“壟斷的地租學說”聯繫在一起，這未免過分加重了所謂經濟學家使用“壟斷”這個字的習慣的變化。在李嘉图時代，這個名詞被廣泛地用來表示：（一）一個人對一種稀有商品的所有權；（二）少數人對一種稀有商品的所有權；（三）商品的稀少性，由於供給彈性為零，所以

价格上涨后不会回落。土地被認為是第三類。我以為，與其說李嘉图對所有這三類有一個理論，一個確定的理論，倒不如說他的理論對於這三類價格的決定都顯得不够，反而更确切些。就李嘉图說，在這三類價格的決定中有一共同因素，就是需求決定價格而與成本無關。今天我們不能把它說成是“壟斷的價值學說”。

熊彼得斷言，马尔薩斯人口論是談論一個虛構的問題，是毫不足道的。1589年巴特羅（Botero）的“空前成就”是“以往所有人口理論中值得稱道的唯一成就”。從17世紀到19世紀的頭十年，“除了一些次要的例外”，“在當時條件下，人口增加也增加了按人口計算的實際收入”。這顯然是不錯的。

然而我認為，回顧一下18世紀的英國，將會把真相弄得更清楚些。當時英國社會正以“人為”的方法來限制人口的增長。可是人口依然在迅速地增加，貧困也在迅速地加深和擴大。如果人們接受熊彼得的論斷，麻煩該是人口不足了。

吉芳斯、門格爾、龐·巴維克和其他人用需求或效用解釋價格的決定，用來代替李嘉图的說明，關於這一替代辦法的妥當性問題，熊彼得象幾乎所有近代理論家一樣，堅決站在“奧國學派”一邊。實際上，奧國學派理論只是補充了英國古典理論應當補充的部分，也刪除了其中需要刪除的部分，或刪除了不致造成重大損害的部分。讓我們區別以下兩個命題：（一）在價值理論中需要引進邊際效用分析，作為價值的主要的或“根本的”調節者；（二）需要或容許不把成本作為價值的第二個主要的或“根本的”調節者或決定因素，這一成本是就反效用或負效用，或為了將來消費而犧牲目前消費或閑暇，或放棄滿意的職業而就不滿意的職業這些意義講的。自從吉芳斯等人的著述以後，不會有經濟學家懷疑第一個命題。只是在第二個命題上，爭論還沒有完全停止，而且我也抱有疑問。

馬夏爾在他的體系里採用了邊際效用分析，但拋棄了第二個命題，我和艾奇渥斯（Edgeworth）、陶西格（Taussig）也是一樣。我認為，一方面接受第二個命題，同時又以為某些或所有生產要素數量是不確定的，是它們的報酬率的函數，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我還認為，對生產要素數量的不同處理方法，是馬夏爾體系和“奧國學派”體系間唯一重要的區別。然而熊彼得對馬夏爾體系中有關這個問題的評論是：

“馬夏爾的理論結構……是和吉芳斯、門格爾、



維也納黑格爾學說會議述評

(法) 谷溫(J. Gauvin)

“德國黑格爾協會”(簡稱“黑格爾協會”)的目的是“研究黑格爾的精神遺產”^①。從最近在維也納召開的一次會議(1960年11月19~20日)的題目上:“黑格爾與歷史”,就足以說明該會一心要將黑格爾的思想和今天的爭論作一個比較。

就那次的討論,我們想在這裏簡單地追述一下討論的題目和氣氛。應當指出的是,在差不多所有的報告中,關於黑格爾在其形而上學方面的思想只是提了一提。維也納代表,克萊納先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黑格爾思想,這樣提法的本身,首先並不意味著黑格爾本人的思想,那末我們怎麼能夠把黑格爾的思想和今天的爭論作一比較呢?那末重要的是儘可能明確的確定我們的地位和他的思想應放在怎樣的一個關係上才算是正確的。有些在原則上會引起爭論的報告,是不是應該具有一個穩固的注解基礎,以便使人們在拿出黑格爾思想進行交鋒時以及根據各種觀點而建立起來的交鋒具有一個明確的意義?

在這裏要提到的不僅是一個方法問題,實際上

是很重要的方法問題。關於斐沙爾(Fessard)神甫的報告^②以及他的神學觀點,馬索羅(Massolo)^③和羅西(Rossi)^④兩教授的報告都是論“青年黑格爾的神學著作”,特別在羅西教授和韓丹爾(Heintel)教授之間引起了一場從方法問題開端的爭論。但是爭論的範圍很明確:我們能不能把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學說撇開不談而專談黑格爾青年時代著作中的黑格爾辯證法和這個辯證法在黑格爾晚期著作中的發展呢?如果我們根本沒有按照黑格爾體系所規定的方法來談黑格爾對自由的概念,那末,我們所談的自由能夠真正的符合於黑格爾的自由嗎?羅西教授高興地認識到黑格爾的自由概念是與絕對精神的學說相聯繫的。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又說,難道黑格爾思想現在已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嗎?難道它已失去了人們對它的尊敬,而它自己也放棄權利了嗎?

我們認為,有一件事是頗為遺憾的,就是有人堅持要證明我們可以根据“神學”或“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研究黑格爾,忠實於努力作注解;老老實實地把我們的努力,不但放在對歷史的認識上,而且對形而上

尤其華爾拉斯,基本上相同的……”

“……馬夏爾的《原理》一書附錄中注釋 XXI 是他和華爾拉斯的模型基本相同的決定性證明。”

其實,馬夏爾的注釋 XXI 是把下面一點作為一系列假定之一:“(iii) m 個供給方程式,每個方程式把一個生產要素的價格同其數量聯繫起來。”而在吉芳斯、奧國學派或華爾拉斯的一系列相應假定中,生產要素數量是個常數。在形式分析中,沒有疑問的重要數量是常數抑是變數,肯定是最根本的問題。要是把生產要素數量當作變數,作為它們的價格的函數,就為開展廣泛的分析開辟一個園地,需要人們進行勘探了。李嘉圖和馬夏爾都曾經勘探過,而“奧

國學派”卻不會,只是把它作為一個次要問題。

熊彼得對於完全競爭下的靜態均衡的意見,就我所理解的來說,我知道為什麼要有全面的和個別的完全均衡,每個企業家須是利潤為零的企業家。然而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認為這也是馬夏爾或華爾拉斯靜態均衡的必要條件。我以為,他們的體系只要象平衡的魚缸式的全面均衡就行了,這裡,企業(魚)和生產要素(草)不斷新陳代謝,只有總量不變。在這樣的均衡狀態下,個別企業是會有風險的,這個模型,比起不但全面而且各個單位也要均衡的模型來,要更實際些,至少就某一些目的來說更有些。

(陳彪如摘譯)